

1992

新会市政协赠阅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



41

91

新会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一辑

新会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

第41辑

编辑：《新会文史资料》编辑部

（广东新会城大新路52号 邮政编码529100）

出版：新会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封面设计：余其万 封面题字：谭仲川

印刷：新会学校印刷厂

出版日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出版证：广东省出版物91粤准字第92号

EA75/31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目 录

- 杂忆战时新会县动员委员会……………伦海滨（1）
我记得天亭这个地名……………爱泼斯坦（8）
从无到有的我县乡镇纺织业……………林畅汉（12）
建国前的新会邮政业务……………何 堂（21）
加强纪律性，抗日无不胜（下）……………
……………容忍之·容慧中（23）
开办农业、渔业保险业务的回忆…张振鸿（32）
两块“高产田”……………伦海滨（40）
忆会城镇店员工会筹委会……………梁 炽（43）
新会的诗社……………何卓坚（46）
捉了一年“迷藏”……………钟克夫（50）
平山小学田径运动发展概况……………林智文（54）
谒梁启超墓……………董毓林（58）
抗战前的县立短期小学……………何卓坚（60）
新会李天等乡抢花炮……………何 堂（62）
新会城街名考……………朝 练
上巷·下巷·西头园（13）铜鼓井（17）金钢地（53）
白米巷（57）城隍庙街（59）县前头（61）水关头（63）

杂忆战时新会县动员委员会

· 伦海滨 ·

人生聚散本平常，
相会蓬江乐举觞。
肺腑重抒心更暖，
话长情重喜洋洋。

* * *

战友重逢庆白头，
荆途踏遍已忘忧。
霜摧雪压虬枝壮，
喜沐春晖共展猷。

* * *

青松愈老色弥新，
兴到行歌笑隐沦，
壮丽河山今更美，
白头相对倍相亲。

* * *

半纪沧桑岂易跨？
培元正本莫蹉跎。
今天共约明年会，
预祝冈城诗更多。

弹指已是51年

1937年抗战军兴，国民党新会县党部为适应形势要求，成立“新会县御侮抗日救亡会”。第二年一月易名为“新会县民众抗敌后援会”，在江会两地展开宣传工作。经过半年时间，广东省第五区游击司令部在江门成立，内设有政

训室，后司令范德星又委其子范以超组织政工团。一个单位有两个宣传组织，力量分散。广州沦陷后决定团（政工团）、室（政训室）合并，组成“政治工作团”，既做部队的宣传工作，又做群众的宣传工作。11月间，新会县党政军机关联合组成“新会县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邓植之，副主任李务滋、李淞甫，下设有秘书，和总务、调查、宣传、筹募、交通、救护、妇工等八个股，工作团也扩大组织，吸收一批爱国知识青年，其中有不少是抗先队员，经费在地方款项下拨给，人力、财力、物力都比较充裕，组织也比较健全。

1939年3月底4月初，日军入侵江会，由于国民党政府事先没有做好撤退准备工作，人员星散了，只有文植虞、刘锦沛、林树登等十多个政工队员撤退到石咀，再转到牛湾、六堡等地。在台山找到主任邓植之，组成“新会县战时工作队”，改属新会县政府领导，文植虞任队长，刘锦沛任副队长，给养由当地分乡所负担。十几人编成三小队，分别到保七团、保十团驻地的新开、新鹤、江佛公路等前线去工作。

争取沦陷区青年的回归

同年秋间，战事渐趋稳定，遵照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指示，重新组织“新会县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县长李务滋兼任，副主任委员由挺七司令周汉铃和国民党新会县党部书记长张荣键兼任，还有一些委员。当时规模很小，只有秘书、干事两人，只处理日常行政公事，和县党部合署办公，设在双水上凌乡居敬张公祠内。

1940年1月，林仲棻接任县长，主任委员也相应易长。组织扩大了，副主任委员有李汝恕（挺七政训室主任）、莫朝雄（国民党新会县党部书记长）、周汉铃、方乃卓等，黄虹任秘书，负责一切事务。下设总务、组训、宣传、征调、妇女、慰济等股，并设工作团，团长文植虞、副团长刘锦沛，团干部有崔卓峰、文瑞卿、林树登等及工作人员，人数已达百余人，经费每月由县府在拨款拨给大洋2212.22元，职员每月工资30元，队员发给生活费18元。

工作队员遍驻在第三区（江门郊区、杜阮、井根一带）和10区、15区各地，宣传采用分散方式，到群众家去访问，到散仔馆去谈心，与群众交朋友，开办妇女识字班等，获得群众好感。就在棠下成立了动委会第二分团，以后还在石咀、陈冲、天湖、塔岭、黄冲、沙富、六堡以及县立一中、二中、三中、五小、千顷中学……等地和学校成立14个分团，每月只给些许宣传经费，人数共有一千多人。

争取沦陷区青年回归工作，在当前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在沦陷区吸收爱祖国、爱家乡、决心抗日的热血青年。在我们一群中，不止有只身青年回归，还有全家族的青年联袂回归，如陈雪娇、陈琼仙、陈雪惠、陈筹波、陈雪杏等五人（人们戏称为“陈氏家族”）、文植虞、文瑞卿、文葆真等三人，就是具体的例子。那时物价已高，伙食费几占去生活费的一半有多，我们也从不计较生活的清苦。

在弹雨中散赈

1940年6月2日我军大举反攻第8、9、16等区，获得空前胜利。俘获伪华南军总司令方正华、第三大队长莫福标、

中队长赵乔岳、敌特务机关特务长林全、龙泉乡伪日警团长吴奕和等大小汉奸30多名，并伪军400名。

我们接获捷报后，即派出工作团第1、3、4、5队队员前往办理善后工作。

在途中，我们高唱《古井大捷歌》：

古井反攻胜利了，

新会同胞在欢笑。

争取伪军反正，

汉奸败类一扫清，

打击敌人无处逃命。

政治重于军事，

谁也不能否认。

新会的同胞们，

紧密地团结起来，

踏着胜利之路，

打回江会老家去！

在收复古井的第二天晚上，我们把赈米60包（每包200斤），午夜2时运到古井。那时天还没有亮，同志们便把一包包大米扛着去散赈。

几天来敌机不断狂炸报复，到处的民房还在熊熊大火，乡民都自动疏散。如果我们来迟些就没法找到一个人。我们的到达，正是他们准备疏散的时候，经过有力的呼唤，人们才慢慢靠拢过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才围绕在赈米队的旗帜下。

我们迅速把赈米发放给群众，人们笑逐颜开，深感祖国人民的关怀，愤恨日本鬼子的惨无人道，有的激动得流下热泪来。

天亮了，敌机来了，在不远的地方投弹。

记忆中，这样的散赈，以后还有好几次。

前线劳军

六月八日，群众前往古井劳军。连日来滂沱大雨，但不能阻止我们前往的决心。

清晨，我们从天亭出发，到了三村，参观胜利品展览，还访问几位俘虏。

这时，敌机来了，一批又一批，飞得很低，我们躲在大树下，小溪边，注视着敌机的盘旋和投弹。

炮声，越来越响，机关枪声也一样的密，渔艇，货船拼命地向下游奔避。古井口与慈溪冒起一缕缕长长的黑烟，银洲湖泛起无边的大浪。

沙口没法渡河，就转过仙洞，还是没法渡河，我们被迫停止前进。

第二天，天气晴朗，但战云还在密布，费了一番口舌才渡过了河。

轻舟快桨，渡过了银洲湖面，夜幕开始笼罩大地。我们踏着暗淡的月光，越过古井泾，到了最前线的警戒线。我们特别警惕，防止敌人的察觉。到了古井圩，转进文楼乡的一所大祠堂，向关宇定主任献了锦旗。

到孖洲、泗冲，向邹大队长献旗，又和战士畅谈收复古井的感想。午后，我们集中沙堆，慰劳工作才告一段落。傍晚，安祥地渡过黄金色的银洲湖，踏上归途。

劳军工作还不止这一次。记得在1938年12月10日，广州沦陷后不久，在江门到古劳、沙口（九江对岸，鹤山县属）前线慰劳抗战战士。那时前线地段公路均奉令破坏，仅能通过

一辆汽车。我们归时因岁晚天色早黑，司机是从广州撤退来的，道路又不熟悉，就在一个急转弯的时候，驶落路下，汽车四轮朝天，代表十多名连邓植之在内，都受了重外伤。当时沙坪医院设备简陋，病床不多，没法容纳这么多的病员。后来用汽车载回江门，由钟英俭、许燊南、许瑞麟、钟应期等医生免费医理到痊愈。

温暖战士心

1940年秋末，时届寒冬，地方团队还没有寒衣拨到。战士要坚守阵地，打击敌人，除要吃饱肚子外，还要有棉衣御寒。我们目睹这种情况，就自觉肩负起劝募棉衣的任务。

由工作团组织小分队，在当时县内水陆交通要道的双水、石咀、七堡、司前、棠下、黄冲……等地，设站向商旅劝募，不论早晚日夜，不分风雨寒冻，轮班工作。在劝募中，不是说那容易，有时要费尽唇舌，讲清道理，使他们自觉地捐钱出来，有的是几角钱，有的是几元钱，最多的不超过十元钱，我们多少不拘，捐多少都表示他们的爱国心。为了捐款，给予收据，使人们知道是点滴归公。

经过大约有两个月时间，捐得大洋近万元，我们集中上缴县府，由县府统一缝制棉衣。那时物价还低，每套棉衣裤造价用不上十元钱。这笔款可以缝制几百套。除发给地方团队外，因我们多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青年，也欠缺寒衣，也发给我们每人一套。

得来的捐款，后来编印成《征信录》，可惜如今已找不到这本书了。

当棉衣送到战士手上时，战士们内心发出微笑，好象温暖了心头。

没有不散的筵席

1941年元旦，动委会和工作团宣告结束。历时四年时间，经过不少的风浪，我们还是团结在一起，还做出不少的成绩，这是地下党团从中领导分不开的。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吃的是红糙米饭、大头菜、豆豉，睡着金针菜蒸鲢鱼的地土（比喻睡在禾草堆上），穿着碎布制的千里马，行走在泥沙路上，没有半点怨言，整天都是嘻嘻哈哈，从来没有一个人开小差。人人心情舒畅，团结得象一家人一样。

恰巧这时县长林仲葵调去茂名，我们依依不舍，他是个开明人士，敢于任用进步青年，曾遭受到反动势力的围攻，说有“异党”渗入，要进行改组，秘书黄虹，宣传股主任冼坚等被迫离职，但吸引进来的是钟克夫，也是地下党员。工作团的地下党员，仍然在活跃着。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在1月13日在欢送林仲葵离任仪式之后，我们奔向各方，仍为抗战流血流汗。不久，陈筹波就在湖南长沙会战时献身祖国。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半个世纪，虽然经过风风雨雨，我们还是站在各个岗位上，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余热。每年九月九日老战友们仍欢聚在一起，或在冈州，或在蓬江，回忆当年是青春小伙子，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畅谈往事，丰采不减当年。

1991年9月15日·会城

我记得天亭这个地名

爱泼斯坦

2

钟华说明：我写的《与爱泼斯坦相处的一天》（见本刊39辑（先在《南粤记者》）刊载后，曾寄给爱泼斯坦核阅。随后接到他一封英文复信，作了一些核实和补充。经夏英林、郑树荣同志的译校，又将中译文本寄请审阅。本年8月1日他给我复信，说：“对我的信翻译得很好，只个别地方有些改动。”并同意发表。（题目是我加的）

亲爱的钟华同志：

来信获悉，不胜感谢。接到尊函，使我非常高兴，它唤起我许多往事的记忆。我也想请你海涵，首先没有尽快回信（我一直很忙），再就是用英文回信（我会说和读中文，但不能顺当地写）。

当然，我记得天亭这个地名以及在那里的境遇。我也记得那一次夜晚的长谈，尽管在后来的记忆里好像是一位给报纸撰文的小学教师。是我错了？还是你那时也在任教？（华接：当时我是在天亭平山小学任教并兼任《前锋报》编辑）

你的名字——我猜是你的笔名——也唤起对我们共同战斗友人金仲华的深深情谊。他后来在“四人帮”迫害下悲

惨地死去。金仲华曾是我在《保卫中国同盟》时期的同事，该同盟1938——1941年在香港由宋庆龄领导。后来，在《中国建设》的早期，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只是我的同事和领导。如果金仲华知道他的一个学生（华按：我是由金仲华任副院长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一生干记者这一行，作为对他的老师永久的纪念，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你在《南粤记者》上发表的忆旧，许多地方跟我的记忆相符，而且很大程度上使我想起那次经历的情形和心境。多少年来，那情景还是历历在目。

应你的要求，对你的记述作些补充和订正，同时问一两个问题：

关于时间问题。据我的记忆，大概是五月左右，不会迟至夏末。我们3月18日逃离香港拘留所，然后在澳门逗留两至三周。

关于同行的外国人数。你的印象是七、八人，准确地说七人。除我外，还有两名美国人，两名英国人以及一对领事夫妇。这位领事不是波兰驻香港领事，而是荷兰在广州的商人兼“领事”。也就是说，他不是外交官也不是正式官员，而是一个商人。当时在广州没有正式荷兰领事，荷兰政府授权给他执行一些领事事务。他的妻子是奥地利人。他俩的经历跟我们不同。我们五人是从香港逃出来，他们两人从未被捕过，也不是从香港来，而是当日本人入侵时他俩正在澳门游玩，并且也渴望到重庆去。他的妻子精神不正常是真的。

她的病可追到更早一段时间——她是一个逃避希特勒的避难者，她的精神是在几年前纳粹在欧洲反犹太的暴行中受到打击的（跟我一样，她是犹太人）。甚至当我们抵达天亭

时，她还不相信是安全的，而且认为我们会被移交给日本人（日本是希特勒的同盟者）。在我们其余人当中，在靠近天亭登陆时，谁也没有由于恐惧而紧张，尽管我们确实很累。在我离开澳门的最后旅程中，大家都有说有笑。

你对当时复杂情景的描写，游击队员、伪军、海盗各自控制一些村庄的情况，当然是无误的。你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清楚帮助我们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也是对的。我是在香港从萨空了同志处，得到澳门一位陈医生的住地（华按：即陈满医生），由他安排荫蔽，才使我们脱离虎口。他们对进步分子友好——他们没要我们的钱。那位荷兰商人兼领事及其妻子，是由澳门的英国领事给他们介绍的。我的印象是，他们（接送我们的）能通过日本驻扎地区的边缘，他们不仅偷渡人，而且还走私商品。他们不但与天亭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有联系，同样还与伪军显然也有联系。所以，很难说清楚所有的人是谁以及他们的身份。

现在，为了将来我写回忆录时在历史材料上不致于出差错，我很想清楚知道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因此，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华按：已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另函详告）

总之，他们待我们很好，除了那位精神病患者外，我们大家都信任他们。他们在澳门渔港很巧妙地掩藏我们，把我们在一艘船转到另一艘船，等等。顺便说一句，我们不是乘机帆船，而是乘“蛇形船”——又长又浅的船。由站立的船夫划船，船很快很静。我们只在夜晚行走，白天在小溪流中休息。在这次旅途中，有一次我们处在来自日本人直接威胁的危险中当时是决定性的一个夜晚，要通过宽阔的河面，但不远处遇到日本人的一艘带有警犬的巡逻船，这警犬大概已听

到我们的声音了，所以它们开始吠叫。

顺便再说一下，那位天亭的县长，他过去是认识我们的。这又巧遇了。两年以前，当日本人袭击广州时，我和别的记者去前线并且呆在一个营的指挥部里。我们离开不久，该营部就遭到日本坦克和飞机的突然袭击而被歼。这位指挥官不知怎样跑到广州（此时日军坦克已侵进广州市内），并且到了我的旅馆房间（我曾给他一张名片）。他已换了便装以便通过珠江从沙面到花地或河南。无论如何，1942年天亭县长就是这个人，并且他还马上记起我。我不知道那时他是否跟你说过什么，也不知道他是那种人，他后来怎么样。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至于那时我说汉语的能力——很不流利，承蒙你过誉，不胜感激，尽管我努力想清楚地表达但还是相当拙劣。

我认为我的思想，如你所述，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认为日本将被打败。跟中国革命者和进步分子一样，我坚信这一使命，将由跟他们不共戴天的人民和军队来完成。我已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并且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一些联系。我们逃出虎口的人中，其他两个人——我的英籍未来妻子邱茉莉和——美国机械工人冯·内希也与共产党人有联系，冯·内希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没有他的经历、胆量和技巧，我们的逃脱根本不会成功。冯·内希现年80左右，是除我外唯一健在的我们这一群的成员。他定居美国，我希望今年下半年访问时能见到他。

衷心祝愿，并再次表示谢意。

爱泼斯坦（英、中文签名）

1991年5月21日

从无到有的我县乡镇纺织业

• 林 畅 汉 •

我县乡镇纺织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指导下，从1983发展起来的。至1985年底止，织造、服装厂已有92间，职工人数9200多人，固定资产原值2230万元，已成为乡镇企业中最大的行业之一。在全县纺织业中，乡镇产值为22.6%，区乡的纺织业已成为乡镇经济的重要支柱，“六龙”之首，具体情况分述于后：

乡 镇 的 织 造 厂

区乡的织造厂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而飞速发展的。1983年全县只有杜阮镇一间纺织厂，织机30台，职工89人，总产值44万元，创造税利近4万元。近三两年来，在县两轮的带动下，乡镇两级兴建纺织的热潮如火如荼，1985年底，已建有纺织厂25间，织工人数3700人，拥有织机1300台（其中K274丝织机1100百台，1515绵织机190台，纬编针织机10台），固定资产原值1480万元产值820万元，利润250万元，上交税金330多万元，其中区一级的织造厂有13间，职工数3000人，厂房面积16800多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1164万元，产值7500多万元，较大型的镇有罗坑丝织厂，拥有丝织机120台；三江纺织厂拥有纺织机78台；杜阮织造、染织厂拥有织机82台；棠下丝织厂拥有丝织机83台；牛湾丝织一、二厂拥有织机76台；双水纺织厂拥有绵织机72台；环城

丝织厂拥有丝织机68台；崖西镇除拥有40台丝织机外，还在日本进口了10台，具有八十年代先进水平的纬编针织机。乡办纺织厂有12间，职工人数近千，固定资产原值300多万元，1985年产值680多万元。乡办织造厂由于资金不足，一般装机较少，其中较大型的有环城泗丫纺织厂，拥有织机40台；会城镇城东绸织厂拥有织机30台。（见下页表一、二、三）

纺织产品也由一两个简单品种，迅速发展琳琅满目，有西装呢、华达呢、影条呢……；有胚织染整、色织；有纯棉、纯丝和棉丝或丝棉混纺产品，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为丰富人民生活作出了贡献。

·新会城街名考·

上巷·下巷·西头园

朝 练

上巷、下巷、西头园都在西山下，贴紧城墙下，分上下两级，房舍低矮，多是泥墙。贫户居多，可说是贫民窟。

抗战爆发，会城沦陷，平山小学、闾邑书院一带，都成为日军驻地，日军肆意骚扰，居民鸡飞狗走，建筑材料被日军搬走作防御工事用，附近渺无人烟。

抗战胜利，平山小学复校，闾邑书院改为一中校址，解放后，一中扩建，上巷、下巷和西头园都改作课堂或运动场，面积倍增。

西头园又名西园巷，这些地名已鲜为人们所知道了。